

配合新版中学语文教材

The New Rostrum



新讲台

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

新讲台

洪子诚：《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分析

孙玉石：悄悄是别离的笙箫——重读《再别康桥》

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 赏析

钱理群：《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

赵园：《边城》——一个关于水的故事

刘纳：传达生活内在的欢乐——读《受戒》

蓝棣之：谈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

周先慎：千古传唱的名篇——《岳阳楼记》 赏析

郭英德：被严重扭曲的人格——《范进中举》 评析

董乃斌：君子人格的赞歌——读周敦颐的《爱莲说》

吴晓东：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

程光炜：普希金《致大海》 赏析



◎王丽 /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讲台

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

洪子诚：《雾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分析
孙玉石：《悄悄是别离的笙箫》——重读《再别康桥》
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
钱理群：《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
赵园：《边城》——一个关于水的故事
刘纳：《传达生活内在的欢乐》——读《受戒》
蓝棣之：《谈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
周先慎：《千古传唱的名篇》——《岳阳楼记》赏析
邹英德：《被严重扭曲的人格》——《范进中举》评析
董乃斌：《君子人格的剪影》——读周敦颐的《爱莲说》
吴晓东：《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
程光炜：《普希金〈致大海〉》赏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王丽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ISBN 7-80109-436-0

I.新… II.王… III.语文课-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71 号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cctp_edit@ 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203×140 毫米 1/32

字 数:326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80 元

教材·教参·教法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这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个成果是新的教材的编写。新的教材不是只有一套,而是有各种不同的试验教材,这就打破了原有的一套教材定天下的局面。这些教材是不是都比原来的教材好,是不是都是适应我们当前中学语文教学需要的教材,我认为,那是不一定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正在探索中,正在试验中,我们都在力图编写出更新、更好的教材。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途程中,起点总是不完美的,起点的作用就是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带来重新探索的热情。教材永远是无法完全固定下来的,它只能在变化中求适应,在变化中求发展。教材的改革是需要不断进行的。

教材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教材的改革又必须是十分慎重地进行的。我认为,在整个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最需要相对稳定的恰恰是教材。1949年之后,我们进行过多次的中学教育的改革。一说中学教育的改革,肯定首先是语文的改革。物理、化学、代数、几何是很少改的,改也不是伤筋动骨的大改,而是部分内容的调整。语文就不行了,每一次改革都是大规模的。而在语文教学改革的进程中,首先改的一定是教材。社会思想一变,我们就得变一套教材。“大跃进”有“大跃进”时的教材,“文化大革命”

有“文化大革命”时的教材，当然，改革开放时期又有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教材。现在我们的社会思想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社会上要求中学教育改革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但高涨还是高涨在语文教学上，而在语文教学中，又自然是高涨在语文教材改革上。为什么呢？因为教材最好改，世界上的文章有的是，总能找出能够符合现在人们思想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文章来。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有讲阶级斗争的文章，就有与阶级斗争相应的和审美情趣的文章；不讲阶级斗争了，我们也能找出不讲阶级斗争的文章，找出与阶级斗争不相应的和审美情趣的文章。是文章就是语言，就可以让学生读，让学生记忆和背诵。这样一改，改革的“效果”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人，不从事语文教学的人，看中学教育改没改看什么？看语文；看语文教学改没改，看什么？看教材。至于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学的最终效果怎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如何？语言素质如何？对他一生的成长和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难看得到的。实际上，从外人看来，教材最容易旧，而从语文教学的本身来看，教材则是最不容易旧的，因为教材虽未变，但学生却在变，对于每一届的学生而言，教材都是新的，都要重新学，重新读。所以，我认为，教材只有适应不适应教学需要的问题，而没有新旧的问题。只要适合现代中学生阅读和欣赏的文章，只要对尽快提高学生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有好处，所有的教材都是新教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重点并不是教材。教材当然也要改，改是改那些不适于学生阅读和欣赏的教材，而不是教材要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改，要随着我们现在的思想需要和审美需要改。社会思想的变化太快了，过不几年就有一个新潮流。新的潮流来了，连编教材的人的思想都变了，教材又得变。让全国的中学教育、全国的中学教师和中学

生都跟着我们变,中学语文教学就没有一个安生的日子了,就没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机制了。我们必须看到,中学语文教材的编选原则不是当时历史时代的需要,不是我们这些编教材的人们的需要,而是中学生学习民族语言、提高掌握运用民族语言能力的需要。他们学习的是构成民族语言基础的东西,不是或主要不是我们当前急需的部分。这个基础的部分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现在的需要中,而是体现在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经典性的范文中。这些范文是一个民族的成员普遍熟悉的,它们的语言和语言表达形式是在我们的语言交流中经常使用的,所以也是中学生最需要掌握和运用的。而在这些作品中,还要选择适合于中学生阅读和欣赏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更有利于他们的掌握和运用,更有利于提高他们学习民族语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这两个限定,中学语文教材就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不能只是跟着我们的希望变。历史上的好文章并不是无边无沿的,而适于中学生阅读和欣赏的文章就更少,虽然我们要随时把当代新创作出的这类文章选编进去,但变动的幅度不会太大。与此同时,教材的相对稳定对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也有好处。语言文学作品不是馒头,不是拿过来就可以吃的。语言文学作品不但需要了解其背景,疏通其文字,还需要不断品味,不断体会。越是熟悉的作品,越是反复感受、反复思考过的作品,教师的感受越深入,体会越深刻,教起来也越是眉飞色舞、自由生动。教师也得和戏剧演员一样,不能场场都演新戏,不能刚背过台词就上场演出。得有一些保留剧目,观众是新的,剧目是旧的,听的新鲜,演的到家,演出效果自然就好。中学语文教学也是这样。总之,教材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要向相对稳定的方向努力,不要老是朝求新求变的方向努力。要越改越稳定,不要越改越不稳定。

教材的稳定性还表现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不论教材改

革的呼声多么高,不论人们对已经编出的教材还有多少意见,当这套教材投入使用,教材就有了稳定性。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换一些篇目,但不会太多,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自己编自己教的教材。也就是说,中学语文教师对教材的主动性是很小的,他的主动性主要表现在教学过程中。

一般说来,教师有了教材,就可以进入教学过程中去了。教材是编给中学生阅读和欣赏的,教师自然就更能够阅读和欣赏。如果连教师自己也无法读懂的文章,我认为是不应当选入课本的。但在中国,中学教育的国家主义性质把教参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起来。在过去,我们总认为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思想,只有一种最好的教学方法,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怎样教,都得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是以教参的形式传达到中学语文教师之中的。教师没有自由阅读和欣赏教材中所选语言文学作品的权利,学生就更没有这种权利,再加之高考的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划分,就把教参的地位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来,结果出现了教师教教参,学生记教参背教参、考试考教参的局面。教参重要起来了,教材反而变得极不重要了。这就像到商店里买东西,只把商品的产地、厂家、规格、用途、价格记了下来,却没有把商品拿回家一样。这就把我们的语文教学抽空了,语文教学提高的不是学生实际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而是给语言文学作品插标签的能力。我认为,我们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这个教参的改革较之教材的改革更是关键性的。在这个领域里,只改革还是不行的,还得革命。不只实际上要革命,观念上也要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内容就是语言文学观念的革命。语言文学作品是做什么的?是实现思想交流的。怎样交流?以文本为中介交流。作者创作文本,就是叫读者看的,就是叫读者理解自己的。文本就是作者和

读者的中介,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中介了。教师和学生都是读者,他们都必须直接阅读和欣赏作品文本,通过文本的语言感受和理解它的思想或感情。这就像一男一女谈恋爱,得两个人直接谈。各自对对方的印象如何,就从他们各自的亲身感受中总结出来,不需要当中再加个媒婆。教参就像夹在恋爱双方的一个媒婆,并且这个媒婆的权力好像有无限大。人家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并不重要,她的看法才是惟一正确的。人家自己不能拿主意,非要按照她的意见办。不按她的意见办,就是不可容忍的,就是绝对错误的。这不太荒诞了吗?要这样,还要教材做什么?直接学教参多好!这是不是说教参就绝对不可要学了呢?也不是!教参,教参,就是教师教学中的参考。教师对参考的东西是有主体性的,有主动性的。他可以同意教参中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教参中的意见,即使同意,也不是照搬,只是作为自己全部感受和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他对课文的感受和理解,还得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形成。在我国,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是极其有限的,中学图书馆的藏书普遍较少,偏远地区的中学甚至就没有图书馆。教师要教好一篇课文,当然首先是一个读者,但却要有超于一般读者的知识范围。一般读者只要读懂课文就行了。教师不但要懂,同时还要有超于“懂”的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更细致、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课文,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作者的语言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并且是书面的语言。这些教师需要掌握的东西,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未必能够找到,未必容易找到。这就需要有教参。这样的教参不是指令性的,而是为中学语文教师提供方便的;不是规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而是为教师设计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和空间的。它不是限制教师的主体性、主动性、自由性的,而是提高教师的主体性、主动性、自由性的。在王丽女

士所编的这本《新讲台》里,就是收的这类的文章。它不是国家机关统一印发的正式的教学参考书,但也能起到教学参考的作用。本书的作者都是相关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如上所述,中学生所要学习的是民族语言的基础部分,中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涉及的范围更广,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论说的、叙事的、抒情的,只要是运用民族语言写出来的好的作品,中学教师都要教。在这个意义上,中学教师开的是民族语言的百货商店,而这些专家学者经营的则是专营店,卖帽子的专卖帽子,卖鞋子的专卖鞋子,研究外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营店里的货品品种不齐全,但具体到一种商品,则比百货店里的种类多。现在让他们对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中学语文课文的感受和理解写出来,编成一部书,对于中学语文教学自然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再好的参考还是参考,参考是不能直接进入教学过程的。进入教学过程的只有教师,教参只有融入到教师对课文的感受和理解之中、成为教师对课文整体感受和理解的一些因素,才随同教师进入教学过程。到了课堂上,教参就没有意义了,教师就是一切了。教师要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讲,按自己的学生能够喜欢、能够更好接受的方式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编写教参的人不是“君”,教师也不是为“君”出征的“将”呢?

教参是教参编写者与中学语文教师的对话,是教参的编写者说给中学语文教师听的;教学过程是中学语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主要是教师说给学生听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教材,是以教材为对象的。教参的编写者不论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是为了语文教师更深入、细致地感受、理解教材;教师不论怎样讲,不怎样讲,都是为了学生感受、理解教材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和运用教材中的语言。教材把三者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种联系又是两

两结合的,不是一递一的传递方式。一份中央的红头文件,从中央一级一级地传达下来,一直传到基层,传到乡镇,还必须是同样一份中央文件。中间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中央的精神了。教参、教师、学生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中间必须变,不变不行。教参是写给教师看的,不是写给学生看的。教师的所“本”不是教参,而是教材,教参只是参考,不是指令。教参说的是教参编写者对教材中的课文的感受和理解,是与教师的感受和理解相互印证的。这个印证,是以教师已有的感受和理解为基础的。学生对课文的感受和理解与教师的不同,能与教师的感受和理解相印证的不一定就能与学生的感受和理解相印证。有一些话,教参上不说教师也知道,但教师不说学生则不一定知道;有一些话教参应该说给教师听,不说给教师听,就有可能影响教师对教材的感受和理解,但这些话说给学生则是没有意义的。教师对教材大都有自己原来的理解,这些理解与教参编写者的理解不一定相同,教参的编写者就要说出来,能不能说服中学语文教师是一回事,但说还是要说的,而学生对课文是没有教师这样的先入之见的,教参上的这些话教师不用对学生说。总之,教参是不能当做具体的教学设计的。教学设计要直接面对自己的学生,要一个个教师自己设计自己的教学过程。即使同是中学语文教师,教的是同样一篇课文,因为学生的不同,也应有不同的教学设计。要说教学改革,最终还是这个课堂教学的改革。课堂教学没有改革,所有其他的改革不论看起来步伐多大,效果多显著,实际上还是等于没有改革。我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最高目标是建立起学生感受、理解、运用、创造民族语言的乐趣和能力,而不是他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到了多少课文,背诵了多少篇诗文,记住了多少具体的语文知识。现在的中学语文课,通共加起来才有多少个课时?即使一个课时也不耽误,才能讲多少

课文？才能让学生背诵多少篇诗文？你能和古代私塾的语文教育比？你能和古代的秀才、举人比？即使你中学语文教师，你编写教材的专家教授，就敢说一定比古代知识分子背得多、记得多吗？为什么一定要让学生与他们比呢？但是，我们的民族语言是不是就不能发展了呢？也不是！这得依靠什么呢？依靠的不是学的课文的多少，背诵的多少，而是学生对民族语言感受和理解的能力，对本民族语言喜爱的程度，运用民族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是说，我们得在培养学生感受、理解、运用、创造民族语言的兴趣和能力的上下功夫。背诵还是需要的，记忆还是需要的，关键是在什么基础上背？在什么基础上记？爱它，喜欢它，再背过它，记住有关它的一些知识，这是一回事。不爱它，不喜欢它，也能背过它，记住有关它的一些知识，这又是另一回事。这正像两个人，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记住了他；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坏，我也记住了他。都记住了，但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我喜欢的人，我会主动地去接近他，了解他，与他交朋友，而对我不喜欢的人，我是不会主动去接近他的。对我们的民族语言，也有这两种分别。有的人爱上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即使没有人强迫他，他还是愿意去看、去学、去感受、去理解、去运用、去创造，我们现当代的民族语言就是靠这样一些人的努力才得到继续发展的。他们也是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像在私塾中读书的老学究那样天天背、天天记才成为一个文人的，但他们的民族语言的素质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虽然从事的不是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但他们对民族的语言是热爱的，他们对民族语言的掌握没有成为他们从事其他社会事业的障碍，而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胜任自己所具体从事的社会工作，虽然他们没有专门从事语言文化事业的人那么广博的语言文化知识，但也不能说他

们的语言素质下降了。我认为,以上两种人都是我们民族语言继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真正反映了语言素质下降的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两种人。一种人在中学的语文学习成绩也不一定有多么不好的,但他们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他们对所学、所记的课文没有真正的感受和理解,也不真正地喜欢它们。到后来,只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看上一两本书,只有在有实际利益的时候才说说话、写写信,久而久之,民族语言就在他们身上干瘪了下去。更有甚者,有一些人对民族语言毫无感情,有感情的只是个人的狭隘私利。为了一己的私利,他们不惜说谎话,说瞎话,吹牛拍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坑蒙拐骗,把我们民族的语言变成了他们玩把戏、搞阴谋的手段,正是他们,把我们民族的语言糟蹋了。我们说我们民族语言文化的素质在下降,就是降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造成的语言文化素质的下降,有更广泛的社会的原因,责任是不应当仅仅让我们中学语文教学来负的,但抵御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却不能不是我们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而只要我们从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我们就会感到,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中心在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的中心则在教法的改革。

在通常的理解中,课堂教学的中心是教学内容而不是教学方法。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教学内容当然是重要的,但内容是由教材决定的,而不是由课堂教学决定的。你选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我还能把它讲成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你选的是莫泊桑的《项链》,我还能把它讲成《武松打虎》?一当到了课堂上,教学内容的问题就是相对确定的了,教法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了。教法的问题是由什么决定的,不是由教材本身决定的,更不是由教参决定的,而是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决定的。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同时面对着教材,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更深入地

进入到教材的语言世界之中去,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教材,并在此基础上把教材中的语言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并且尽量转化为学生的书面语言。教师在教材的语言世界中起的是导游的作用。没有这个导游,学生一样可以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游览,但那是普通的阅读,而不是课堂教学。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应当获得较之普通阅读更加细致深入的感受和理解,发现更多的乐趣,记住更多的东西,并更有效地使之转化为学生的一种能力。正像一个导游不可能让游人记住这个景点的所有景物,感受到它的所有的好处,但他至少要使游客比自己游览对景点有更浓厚的兴趣,感到更多的乐趣,记住更多的东西,并且能够更好地向那些尚未来这里游览的人转述自己看到的東西。这是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任务。首先,教师自己得感受到课文的好处,得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教师自己都不喜欢这篇课文,感觉不出它的好处来。不论你记住了多少教参中说过的话,不论你知道别人为它作出过什么样的评论和评价,都是没有用的。课文不是一头死猪,不是你想怎么宰就可以怎么宰的。课文是由我们的民族语言构成的一个个活泼的生命,你得用心灵感受它,你得用心灵感受到它勾魂摄魄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感到你想说什么以及怎样说。在这时,你想的不是教参,不是专家学者的评论和研究,而是这篇课文本身,是这篇课文使你感动的内容,使你感到惊异的地方。与此同时,你面对的还是你的学生,你知道你的学生已经感到了什么,什么还没有感到。你想说的话那些已经不必说了,那些还必须说,不说学生是自己想不到的,你得领着学生一同进入到课文的语言世界之中去,你得让学生也喜爱上这个语言世界,感受它、熟悉它、理解它,愿意记住它其中的语言,愿意了解有关它的一些知识,甚至愿意背诵它,默写它。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学生并不是那么厌恶记忆、厌恶背

诵、厌恶默写的。他们真心喜欢上什么,就会乐意为其费功夫,动脑筋。学生的生命力甚至是我们这些教师还要强,我们背不过的,他们能够背得过;我们记不住的,他们能够记得住。关键只在于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课堂教学的第一步就是得叫学生喜欢上课文中的语言世界,喜欢上这个语言世界中一些他们能够喜欢上的东西。而你要让他们喜欢上这个语言世界和这个语言世界中的一些东西,光用大帽子压他们是不行的,光讲意义是不行的,光讲这个作家多么伟大、在中国文化史或世界文化史上地位多高是不行的,光讲这个作品多么著名、多么重要、多么有教育意义也是不行的。学生不会吃你这一套。你得一步一步地让他们实际地感到作品的好处,教师与学生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教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过程得由教师来创造,而创造的基础就是教师对教材本身的感受和理解,就是引导学生进入这个语言世界的充满热情的理性。在这时,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必依靠教参就可以从教师的心灵和教室的氛围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你朗诵郭沫若的诗自然会用高八度的声调,你朗诵戴望舒的诗自然会把声音降下来,把速度慢下来,你讲到鲁迅的《孔乙己》自然地不会喜笑颜开,你讲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自然会一遍遍地去读它,并让学生去读、去背,你不会像讲鲁迅的《祝福》那样老想讲它的思想意义。你感到你已经不需要教参的帮助,你已经高高地超出了教参所已经告诉了你的一切,像一个乐团指挥高高地超出了指挥法教科书一样。你的教学效果就在你对你的课堂教学的感受中,在学生的表情和表现里。你不必惧怕考试和外在的要求,因为只有你是教材和自己的学生的朋友,只有你最了解教材和自己的学生对你的期待和要求,你能自己发现自己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并乐意试验各种方式提高你的课堂教学的质量。你变得轻松而又自由,工作不是一个多

新讲台

么沉重的负担,因为你会感觉到和学生一起成为了民族语言艺术的享受者,像一个歌手同自己的观众共同享受着音乐的艺术一样。

教法的改革是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中心,而教法的改革是只有通过中学语文教师自己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的。只要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语文教学改革只靠外部的压力是不行的。政治家让他们强化思想教育,学问家让他们灌输给学生更多的文学史知识,文学作家让他们提高学生文学创作的能力,家长让他们提高升学率,学生让他们减轻课业负担,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期待和要求都落在只有有限教学时间的中学语文教师的头上,他们能够承担吗?而只要把课堂教学当做当前中学语文教师改革的重点,我们就会感到,把中学语文教师从上级下达的各种教学要求的压力之下解放出来,提高他们在课堂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自由性,才是更有效地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关键。也只有当教师的课堂教学有了真正的改革,教材和教参的改革才不是凌驾在中学语文教师之上或之外的上级领导或专家学者根据自己一时的主观愿望所进行的改革。哪些课文适于中学语文的教学,那些不适于,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参考哪些有关的资料,而哪些是他们不需要的,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课堂教学改革之后才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王富仁

2001年2月3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者的话

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已三年有余了。时至今日,这场讨论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讨论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却值得人们长久地思考:中国语文教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到底在哪些地方走了弯路?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补救?

编者以为,中国语文教育的积弊深重,跟长期以来与学术界、文化界处于隔绝状态,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有关;无论是从教材的编写上还是对作品的阐释上,都形成一套十分僵化的模式,且几十年一以贯之。这种模式不但严重损害了学生对文字的感受力和领悟力,也影响了学生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亦与大学的语文教育脱节,反过来又加重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危机。

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文教育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传统。当时的许多大学教师——包括一些名家——课余常到一些中学里去兼国文课,且蔚成风气。那时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种局面,一方面使大学的国文课与中学有一个很自然的衔接,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中学阶段就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活跃的思维,为他们进一步接受大学教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在本世纪下半叶截然断裂了。

编者以为,这种断裂对后来的中国语文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结果便是使之越来越走入死胡同。21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回顾这个传统。基于以上思路,编者从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取部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约请在京30多位著名学者教授撰写鉴赏性文章。这些专家学者大都是各自领域卓有建树的权威,有着丰厚的学养和很深的造诣。他们的解读既深入浅出又颇有新意,其眼光与视野自有其独到之处;且文笔讲究而各有特色,或举重若轻,或剖析入微,皆属厚积薄发之作,亦颇具大家风度。

诚然,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尤其对于那些经典作品,永远是常读常新的,这也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所在。编者之所以约请这些学者教授们来撰写,并非认为他们的解读是最“权威”的,更不是企望读者用他们的解读来代替自己的感受和领悟,而只是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种大境界、大视野,使人们能在那种长期以来已被严重模式化(通过……表现了……)的解读之外,有一个新的视觉,新的天地,启发读者在更高的层次上来领悟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从而真正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来解读一部作品。我想,这对于每一个喜爱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此,这本书的读者不仅仅是中学生或中学语文教师,还应该是所有文学爱好者。

当然,作为一名中学生来说,当他们在初次接触一篇课文(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有着更高的起点、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可供比较的多元的参照系——而不仅仅囿于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某一种见解,并把它作为对付考试的惟一的“标准答案”。这对他们的感受力、想像力及理解力的培养无疑有着很大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说,如鲁迅的名篇《故乡》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传